

## 主編序

面對不斷變遷的社會環境，在各種邊界持續擴充、交融或重構、再造的現實處境中，雕塑如何獲得其應有的歷史定位？隨著全球化現象的急速拓展，雕塑應具備何種跨域的文化特質，以回應上述現象？當代社會對於雕塑的認識，取決於審美性或功能性，或者二者皆是？這些橫諸眼前的問題，牽動著雕塑及其與外部環境聯絡關係的重新梳理，牽一髮而動全身。亦即，在愈趨走向動態性、多元化及包容歧義的現實網絡中，雕塑亟需建立一種更具跨越可能的模式，成為與時俱進的媒介，維繫其在當代藝術史上的能動性，甚或透過內部的自律性演繹，完成當代化的進程。

藝術與非藝術的定義爭議，早在二十世紀初期已然挑起戰火，其中最知名的例子如眾所周知，即為馬歇爾·杜象（Marcel Duchamp, 1887-1968）的《噴泉》一作（1917）。利用日常生活中逐漸普遍的工業產品現成物，挑戰甚或挑釁長久以來人們對於何謂美、美術品的認知界線，在當時被拒絕於公眾前展出，成為落難藝術的先驅。然而時過境遷，現今卻被視為代表二十世紀藝術革命的里程碑、開啓觀念藝術先河的代表之作。此種對於藝術定義「去分化」（dedifferentiation）動向的崛起，揭起一場何謂藝術的世紀論戰，挑戰藝術史僵化而威權的成規、成見，影響至今猶存。

關於這個問題，美國藝術評論家、藝術史學者唐納·庫斯比特（Donald Kuspit, 1935-）曾經提出以下看法：

人們能同時用兩種態度—既視為日常用具，又當作精巧的藝術品—來看待這些物品嗎？這正是杜象希望我們面對其現成品時的態度。它們有雙重身份：既是具有社會功能的器物，又被杜象的創造活動改造成崇高的藝術品。（2004）

不僅如此，他更認為去除分化乃是「現代創造性的核心」，破除過往既有的審美理想，無異於破除階級意識的差異，不具固定身份的現成品，同時成爲一種藝術與非藝術共存的「雙重客體」，超越了審美品味的「好壞之分」。

不論杜象的創舉對傳統審美觀帶來多少的批判與嘲諷，其中所蘊含的現代性意義，在於審美性並非來自物質，而是一種回歸原初式的體驗，其中，日常現實經驗扮演審美移轉的重要角色，產生再創造的全新意義。事實上，歐美百年來對於藝術分化界線的去除或定義的重新調整，突顯審美性或功能性之間必非如此涇渭分明的開放態度，社會與藝術之間建立全新的關係，「人們似乎是擁有它，而不是被它擁有」。主從關係的改變，象徵藝術既存界線的崩解，現今的「藝術品」得以或就是「反審美」、「後審美性」的代表，抽離固有的審美框架及價值，走向日常生活化的各種可能。

同樣地，「去分化」的總體趨勢爲雕塑帶來類似的時代課題，在形式、媒材、觀念甚或是展示、論述的各種領域之中，雕塑無法單純地存在於工作室與展覽間，與外部環境（社會大眾、其他學科、不同族裔等）的接觸、對話無法避免，故而正不斷邁向無階級性、去標籤化或後審美式的全新領域，並在這樣的時代進程中，完成自律性的演化可能，建構符合當代社會在審美需求上的不斷擴充、超越與異化的文化特質、視覺容度。

本期獲得審查刊登之學術論文計有三篇，同樣具有在研究議題及方法學上突顯去單一分化、跨域溝通的全新趨勢，透過抽離固有知識框架及批評意識的現當代學術理念，探討包含社群文化、影像裝置以及跨域雕塑等不同課題面向，呈現本刊近年來的主要學術發展趨勢。按編輯排序其內容大要分別如下：

殷寶寧〈以設計人類學反思學校設計過程初探：阿里山達邦國小

個案研究〉一文，透過文化人類學中有關民族誌研究（ethnography）的方法，尤其是晚近逐漸發展成熟的「設計人類學」（design anthropology），重新探討阿里山達邦國小歷經日治、國府不同的統治時期，在校園設計規劃上對於原住民文化傳承的衝擊；同時，在九二一地震後的重建過程中，轉而以原住民（在地）文化主體、兒童教育作為主要考量，融合不同其文化元素，進行景觀設計的有機整合，同時回應綠化建築、生態設計等全球化議題。

邱廷浩〈社會中的幽靈：重探袁廣鳴的錄像及裝置藝術〉為台灣知名當代藝術家袁廣鳴之個案研究，透過其裝置錄像作品中運鏡手法「幽靈的視角」的分析，探討既寫實又虛幻的影像世界，究竟企圖表達何種視覺美學或人文關照，成為本文最主要的研究核心。作者分析此種幻象空間／異質空間，來自於蒙太奇（Montage）的處理手法，透過景框的運作將時間、空間進行解構、錯置、重組及剪輯，生產、製造出全新影像，營造具有連續、意識性的生命體，最終藉此對自身、家庭、社會等進行多維式的影像反思。

朱家瑩在〈羅伯特·達汀的「巨匠之徑」塑像〉文中，透過法國個別藝術家的多重身份，探討包含繪畫、雕刻、陶藝和建築等媒材之間的複合關係，以「巨匠之徑」（L'Allée des Géants）中的十九件塑像，按「達汀人生經歷與體悟」及「向藝術和文學家致敬」兩部，分析其中蘊藏東、西神話及文學的特殊意涵。過往多將其界定為「樸素藝術」（Naïve Art）或「原生藝術」（Art Brut），然經由本文作者在圖像及文本上的雙重檢視，確定其與超現實主義或女性主義之間的關聯，對其在藝術史上的定位進行平反。

此外，延續本刊近期在學術專論之外的專欄經營及規劃方向，本（十九）期持續收錄日本近代雕塑史研究專文的中文翻譯，以及台灣校園所在公共藝術作品之田調分析，以社會史的研究視角，檢視戶外

雕塑與所處環境、空間的互聯關係，抑或設置者／委託者（政府機關、學校等）、觀眾（社會大眾）及雕塑家三者之間的關係，如何影響作品的製造及生產？並進而從外而內地，再思公共藝術作品中應如何平衡公共性及藝術性的問題—與現實社會的接點。透過上述不同類型的文字討論，一方面希望維持專業期刊在內容、題材上之多元性，以饗讀者；另一方面，作為雕塑研究之知識、交流平台，擴充本國雕塑家、雕塑研究者的參考興趣及學術視野。

白適銘